

■ 历史学

# 明清时期泰山进香及相关问题研究

孟昭锋, 王元林

(暨南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泰山位居五岳之首, 历来备受青睐, 而帝王的封禅、致祭活动, 更确立了其独尊地位。泰山地位的尊崇, 令四面八方的信众齐聚泰安, 登临泰山, 拜谒于泰山神下, 成为泰山忠实的香客。据泰山现存碑刻记载, 明清时期上至帝王将相, 下至普通民众的各阶层人士, 无不亲祀泰山, 将泰山进香活动推至鼎盛。究其原因, 或为显示帝王之正统地位, 或求国泰民安, 或为福寿康宁, 或为游览胜景, 因人而异, 不一而足。朝山进香活动的兴旺发达, 带动了旅店、餐饮及庙会经济的繁荣, 促进了泰山内、外道路的兴修,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当地民众的负担, 使当地的民风民俗、社会风气发生转变乃至恶化。

**关键词:** 明清时期; 泰山进香; 阶层; 原因; 影响

**中图分类号:** K92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72X(2012)05-0077-07

**收稿日期:** 2012-04-28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祭祀与地方民间信仰互动研究”(08BZS042)

**作者简介:** 孟昭锋(1984—), 男, 山东新泰人, 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王元林(1968—), 男, 陕西大荔人, 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进香亦谓之朝山, “吾邑无山, 约在迤北百里之外, 四月丫髻山, 十月景钟山, 村中有进香者, 谓之朝山”<sup>[1]</sup>。后来一般信众到寺庙烧香拜佛, 虽非名山, 亦称作“朝山”或“进香”。如《朝野类要》载: “北宫圣节及生辰, 必前十日, 车驾诣殿进香”<sup>[2]</sup>。“入庙祈祷, 曰进香”<sup>[3]</sup><sup>4</sup>。由此来看, 举凡到名山大寺或庙宇中烧香、祈愿的活动均称为进香。但一般而言, 朝山特指亲赴名山的进香活动, “以本境之祀为未足, 又远至峨嵋、遂宁、云雾、华银等山进香, 曰‘朝山’”<sup>[3]</sup><sup>306</sup>、“尝闻祖父言, 每岁三月二十八日, 四方之士集于泰山东岳祠下, 谓之朝拜”<sup>[4]</sup>、“世俗鄙俚, 以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圣帝生朝, 合郡男女于前期, 彻昼夜就通衢礼拜, 会于岳庙, 谓之朝岳, 为父母亡人拔罪”<sup>[5]</sup>。故朝山进香一般指神灵崇祀者亲赴胜地名山拜谒神灵的宗教活动, 这些远道而来的崇祀者即所谓香客。

泰山自远古时代便是人们朝奉的对象和心中的神山圣地。进入阶级社会之后, 巡守、封禅泰山成为帝王“嗣承正统, 受命于天”的象征, 泰山的政治地位日益提高。在民间, 泰山信仰亦日益兴盛, 经两汉魏晋的发展, 至唐代泰山神已完成了人格化、民间化的历程, 并出现了香社组织, 宋代完整意义上的泰山庙会已经出现并趋于成熟。明清时期随着碧霞元君信仰的兴盛与汇入,

泰山信仰愈演愈烈, 泰山成为全国最重要的进香地之一。“渡江以北, 齐、晋、燕、秦、洛、楚诸民, 无不往泰山进香者”<sup>[6]</sup><sup>66</sup>，“统古今天下神祇, 首东岳, 而东岳祀事之盛, 首碧霞元君……庙在泰山顶, 自京师以南, 河淮以北, 男妇日千万人, 奉牲牢香币, 喃喃泥首阶下”<sup>[7]</sup><sup>187</sup>。据现存香社碑记载, 明清时期, 泰山香客不仅地域分布广, 其所涉及社会阶层也较多。本文拟对明清时期泰山香客的阶级构成、进香原因及影响等相关问题进行探究, 敬请方家正之。

## 一、明清时期泰山香客的阶层分析

明清时期, 泰山进香活动极为兴盛, 其香客涵盖了各阶层中的各种人士。笔者拟以冯尔康先生对社会阶层的划分<sup>①</sup>, 对各阶层的泰山进香活动探讨如下:

皇帝等级中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 到秦皇汉武封禅泰山, 都可见皇族对泰山进香活动的重视。明清帝王除像前代帝王致祭泰山, 宣告其受命于天, 祈求国泰民安外, 也开始关注自我, 祈求身体安康、早生贵子等。正德二年(1507)《御制告文》曰: “兹因眇躬, 偶赉爽调摄, 敬祈圣力, 永佑康宁。特以香帛, 用伸告祭, 益彰灵应, 福佑家邦。谨告”<sup>[8]</sup>。此外, 皇太后、太后、后妃

亦是泰山的忠实香客。弘治十二年（1499）十一月，“太皇太后还居清宁宫，帝孝事两宫太后甚谨，而两宫太后皆好佛老，尝遣中官赍真武像，建醮武当山，使使诣泰山，进神袍”<sup>[9]</sup>。万历二十一年（1593）《碧霞宫祝嘏碑》碑阴亦有太后、妃主、皇子、侍臣题名<sup>[10]211</sup>。宋天书观于明代开始奉祀碧霞元君，万历四十二年（1614）七月，神宗于其母孝定皇太后去世后，上尊号九莲菩萨，构一殿于元君之后奉之，改额为“圣慈天庆宫”，另在岱顶建万寿宫，皆用以奉祀太后<sup>[10]381</sup>。崇祯十三年（1640），思宗追尊其母孝纯皇太后为智上菩萨，后复构一殿于后奉之<sup>[11]</sup>。两皇帝均将其母奉祀于泰山，其本人及太后对泰山的崇奉程度可见一斑。清代皇帝、皇子致祭泰山的例子亦屡见不鲜，康熙帝二十三年（1684）、二十八年（1689）、四十二年（1703）均上谒东岳庙，躬祀泰山之神；乾隆前后共十一次巡幸泰安，六次登临岱顶，上诣碧霞宫，题诗一百七十余首<sup>②</sup>。

皇族贵族中，周府与泰山的关系就较为密切，“周定王橛，太祖第五子也。洪武三年（1370）封吴王……十四年就藩开封，即宋故宫地为府”<sup>[12]</sup>。周府在泰山的建醮祭祀活动随处可见：朝阳洞南之天仙行宫为周府所建、后石坞元君庙为隆庆间周府胙城辅国将军朱睦㮮肇建、泰安城西北之白云观亦为周藩万历三十七年（1609）创建<sup>[13]23,380</sup>。此外，天书观、灵岩寺还存有周府造像、进香题名碑10余通。勋戚贵族进香泰山的记载亦较多，云峰西侧乾封元年（666）《刘仁愿题名》载：“□□卫将军鲁城县开国公上柱国刘仁愿，颖川郡夫人陈□□出身□□二男怀瓚任宏文馆学士。女一人。新妇窈二。新妇于乾封元年二月十九日□□记”<sup>[10]195</sup>。此外，宣德元年（1426）永康侯徐安受皇帝之遣，致祭泰山<sup>[14]</sup>、嘉靖十一年（1532），太子太保玉田伯蒋荣致祭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以求皇帝“仰祈神贶，默运化机，俾子孙发育，早锡元良”<sup>[15]149</sup>。另外，衍圣公孔府世家无论是在政府行为对东岳庙的重建方面，还是个人对泰山一般庙宇的重修方面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缙绅阶层中有奉皇帝或皇室贵族之命进香泰山的达官贵人、有任职于泰山及其周边地区的官员、有借公干机会游览泰山或道经泰山借机拜谒的官员、也有专门从外地到泰山奉送神物，祈求福寿康宁的官员。他们或为“镇压边患”、“水旱灾害”、“盗贼”、“农民起义”、“黄河涨溢”、“运道堵塞”而祭告泰山；或为泰山宫观的开工或完工而致祭泰山；或因岳镇海渎之祭而祭告泰山；或因斋送神像、供器、法器、经书而来泰山。如弘治七年（1494），遣内官监太监李兴等以香帛告

曰：“比者，黄河不循故道，决于张秋，东注于海，既坏民田，又妨运道。特遣内外文武大臣，循行溃决之处，督工修筑。神其默相，用成厥功。使农不失业，国计不亏，不胜惓惓愿望之至。谨告”<sup>[15]91</sup>。而清朝“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以来，每遇四月十八日，遣内大臣赍香帛进谒以为常。御赐彝器炉鼎瓶盃，多晶玉金磁之宝”<sup>[10]208</sup>。后因“（进香）人员由内廷派出，或不免有骚扰驿站之事……将应用香供赍至山东省城，交与巡抚接领，于抚藩二人内酌量一人，亲诣泰山，于四月十八日致祭”<sup>[16]</sup>。故泰山及周边地区的官吏，无论于公，还是于私，均有致祭泰山之事。

士人即举、贡、生、监等阶层人士，他们参与泰山进香的实例较多，从明至民国各个时期均可见到他们的身影。永乐四年（1406）七月，因明出兵安南，成祖曾遣道士严嗣安、监生马武致祭泰山<sup>[13]25-26</sup>。此外，这些士人大都加入平民阶层的香会，并凭借自己的学识撰写香社碑文，如红门宫香社碑林《同治八年（1869）合山社碑》为“大清国山东泰安府泰安县城东焦家林地方敬立”，其中会首36人，全部为男性，第一排会首均有功名：“监生刘忠一，耆宾王文林，贡生王中简，耆宾刘总显，耆宾刘立士”。此外，《王母池·道光十年（1830）合山会碑》、《孔子登临处·道光十三年（1833）皇清碑》、《红门宫·咸丰五年（1855）王母百岁碑》、《红门宫·光绪十二年（1886）元君香社碑》、《灵应宫·光绪十八年（1892）兖州府碑》等碑所载众多香社中亦有庠生、廪生、监生、恩生、增生、耆宾等士人阶层的参与。他们大多成为香社中文人的代表，担负撰写碑文等任务，他们与普通民众构成明清时期泰山香客的主要组成部分。

平民等级是泰山香客中最为庞大的群体，他们一般自发组织成香社，然后结集朝山进香。他们的进香仪式有别于一般性的进香，可分为集体进香仪式、个人祈愿仪式、日常祭拜仪式三类，并具有一套规范<sup>[17]</sup>。现存有关泰山香社的最早史料，是泰安博物馆收藏的唐末五代时期《太岳漆河将军庙堂记铭并序》拓片，它记载了天福年间（936-941）澶州香社在泰山建立庙宇、施舍财物的情况。而北宋元丰三年（1080）《东岳高里山相公庙新创长脚竿记》及岱庙前宋代香社所献之“铁桶”则表明至宋代，香社成员中已有男有女、有官有民；香会成员涉及区域较大，香社的组织形式已相当成熟<sup>[18]</sup>。

明清时期，普通民众的进香活动更为频繁，各地民众进香泰山者络绎不绝，其信奉者“渡江以北，齐、晋、燕、秦、洛、楚诸民，无不往泰

山进香者”<sup>[6]66</sup>。若在三、四月，“五方士女，登祠元君，以数十万，夜望山上篝灯，如聚萤万斛，左右上下蚁旋鱼贯，叫呼殷震鼎沸雷鸣，弥山振谷，仅得容足之地以上”<sup>[15]387</sup>。由于登山进香者人数众多，“旧盘不能容，往往挤堕崖谷中”<sup>[15]393</sup>，万历十四年（1586）四月十八日，由于当天为元君寿诞，登泰山祷祀之人过多，结果“互相践踏，死六十一人”<sup>[15]194</sup>。《燕程日记》记载了乾隆二年（1737）香客进香泰山的情景“十七日，早过泰安州……路逢进香者男妇累累，蓬头俱面，或乘牛车，或骑驴。前负香亭供元君号，一板箱方广二尺许，香贮焉，揭黄布于前为帜……今上登极汰之（香税），故香客倍常耳。沿途控驴待雇者比比，聒声聒耳”<sup>[19]</sup>。乾隆初对香税的蠲除，使香客倍于以往，泰山进香活动再次繁盛，每年香客达数十万人。同时，民间还流传“三山进香”之说，刘慧先生认为，这与民间流行的进香必须三年的传统有关，“三山”意为“三次进山”，即连续三年进香泰山；叶涛先生则以泰山、武当、普陀解释该信仰中的“三山进香”<sup>[20]</sup>，但不论何种解释，都体现了普通民众对泰山神灵的虔诚信仰。

贱民等级是泰山香客中地位最低者，由于其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低下，在泰山信仰中给我们留下的资料较少，但如明人张岱所述：“山中两可恨者，乞丐其一……乞丐者，求利于泰山者也；进香者，求名于泰山者也。泰山净土，无处不受此二项人作贱，则知天下名利人之作贱世界也与此正等”<sup>[21]153</sup>。从中亦可看出乞丐等社会下层民众与泰山的密切关系。总之，泰山悠久的信仰历史，及秦皇汉武等帝王的封禅祭祀活动，使它成为历代帝王显示正统的必祀之地；加之泰山神、碧霞元君的无比灵验及泰山优美的自然人文景观，吸引着各阶层人士因各种公、私事务而拜谒泰山，使其成为明清时期香客最多，香火最盛的宗教旅游圣地。

## 二、各阶层进香的原因分析

明清时期，泰山香客众多，涉及特权等级、平民等级、贱民等级及其所包括的各个社会阶层。由于各个阶层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其进香的原因亦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明清帝王仍像以前皇帝那样致祭泰山，以宣告其受命于天、功德卓越；祈求如国泰民安、天下宁谧、风调雨顺、平弥河患、出师凯旋等与国家存亡、黎民生计休戚相关的大事。明清时期几乎每位皇帝登基之初，都遣使致祭泰山，以显

示其正统地位。建文四年（1402）七月二十二日，成祖遣道士刘真、曹永致祭泰山，告文中称：“建文昏愚，奸臣窃柄，神明弗佑，四海离心，朕奉祖训，来清群恶，荷天地山川之灵，战无不捷，堂堂之阵，直抵京师，岂期建文合宫自烬，朕以诸王大臣再三推戴，于六月十七日躬即帝位，嗣守高皇帝大业。既已昭告于名山大川，特遣官祭以牲醴，惟神有知朕至意”<sup>③</sup>。此外，在关乎国家存亡、黎民生计的大事面前，明清帝王亦遣使祭告泰山。永乐四年（1406）七月，因出兵伐安南，成祖遣道士严嗣安、监生马武致祭泰山，翌年再遣道士复生等致祭；英宗正统九年（1444），夏旱，遣翰林院侍读习嘉言祭泰山祈雨；景泰三年（1452），以河流泛滥，遣太子太保都御使王文祭泰山；景泰四年（1453），以雨雪过多，遣刑部尚书薛希琏祭泰山；武宗正德六年（1511），以兵讨宁夏，逆党就擒，遣山东布政使司右参议徐永告谢泰山；正德七年（1512），遣山东布政使司左参政张津祭告祈年<sup>[13]31-32</sup>。在关乎国家存亡、黎民生计休戚相关的大事外，明清帝王也开始更多的关注自我，开始像普通香客那样祈求身体安康，祈求早生贵子，后继有人。

（二）一般官员、士人及平民阶层，其进香大都具有很强的功力色彩，大多与生老病死、福寿康宁有关。《李嘉乐登岱题刻》云：“兖沂曹济道李嘉乐新擢苏臬，时山东河工江南海防均未蒞事，登岱祷神，为两省生民禳灾，为八旬老母祈寿，嘉乐不敢自求多福，惟名山鉴之。光绪甲申（1884）冬敬题”<sup>[22]</sup>。一般民众组成香社进香泰山，以“祈愿”和“还愿”两种形式进行，祈愿又分专项性祈愿、多项性祈愿和一般性祈愿<sup>[7]66-67</sup>。香客的这种祈愿活动与泰山神尤其是碧霞元君的神职与灵验有着密切联系。泰山神的无比灵验是吸引众多香客拜谒的一重要前提，如《灵应宫·光绪十九年（1893）山东济南万古流芳碑》载：

大清国山东济南府平原邑城西南芝隍庄香社。盖闻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钟灵懿坎，钟灵毓秀，代天地之生生不已者，水之外莫如山，而为五岳之宗，万物之母者，尤莫如泰山。巍巍乎齐鲁所共瞻，青兖之名镇。伊古以来，神灵之封三千，而惟泰山之爵位尊无极焉。至国朝而灵感愈神，合远迹之乡民竭诚虔祷，皆领福报之无穷。平原城西南大芝隍结社朝山已数十年，于兹信善果之可征遑，惜资财耗费，惟心香之欲供，故忘道路迢遥，结善缘者获善报此，自然之感应也。当光绪十六年（1890）叛逆突来，而于社中里居入而复出，独无剽掠之灾，此固防守者之力，抑不尽防守者之力，而以数三年进香于兹，默默中自有庇荫者欤，爰勒诸石以志，永感不忘云。

“灵感愈神”是该香社进香的重要原因。《红

门宫香社碑林·光绪二十五年（1899）同心社碑》亦载：“触石而着，肤寸遍雨，不事崇朝，霖溍浩泽，人固被德于无穷矣。洎澄上祈祷，而感碧霞元君之灵尤著，往往逐人施惠。逮我愚蒙如义明索姓者，素患口口痛症，光绪十三年春，抱病赴山诚祷，回家遂一小如抽，而社亦固之而立，迄今十余年，受福获报口难殚举，众皆感灵验盛大，惠祥宏深。于是筹资立碑，聊以昭诚服之悦心云耳。武定府蒲台县西南路仁字乡赵店同心社”。泰山神的无比灵验，加之“元君能为众生造福，如其愿。贫者愿富，疾者愿安，耕者愿岁，贾者愿息，祈生者愿年，未子者愿嗣。子为亲愿，弟为兄愿，亲戚交厚靡不交相愿”的神职<sup>④</sup>，富贵、平安、健康、丰收、获利、长寿、多子多孙等这些人们孜孜追求的东西，通过进香泰山就能实现。这种灵验和神职功能的普适性，是各阶层纷纷进香泰山及“元君像不及三尺，而香火之盛，为四大部洲所无”的根本原因所在<sup>[21]71</sup>。

（三）泰山悠久的信仰历史、优美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也是吸引香客纷纷拜谒的一重要原因。泰山地处较为平缓的齐鲁丘陵平原地区，其异峰突起，给人以“东天一柱”、“拔地通天”的气势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高山仰止”的直观感觉。拔地通天的气势、优美的自然风光、变幻莫测的气象都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和推测，这对好游的明清民众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游玩胜景”是民众进香的副产品，也是吸引香客的一重要原因。《灵应宫·光绪十六年（1890）山东恩县碑》载“盖闻历代以来天下最崇隆者莫过于泰岱，是山东之大观也。然神灵素著，庙高千古，自天子以至于庶民不可不瞻仰圣像，游玩胜景，诚谓一举而两得也。”《醒世姻缘传》中，当两道婆要主人公薛素姐加入香会时，素姐问道：“那山上有景致么？”道婆道：“山上说不尽的景致，象那朝阳洞、三天门、黄花峪、舍身台、晒经石、无字碑、秦松、汉柏、金简、玉书：通是神仙住的所在。凡人缘法浅的，也到得那里么？”“一席话说的个素姐心痒难挠，神情飞越。”素姐所关注的是泰山上是否有好的风景。书中亦云：“这烧香，一为积福，一为看景逍遥。”<sup>[23]</sup>可见，泰山优美的自然人文胜景，也是吸引香客的重要因素。

### 三、朝山进香的影响

明清时期泰山进香活动的兴盛，对泰安地区道路的兴修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等方面均造成了重大影响，具体表现在：

（一）朝山进香与泰安城内外道路的兴修。在交通欠发达的中国古代，一般民众出行往往以步行为主，这就使得交通条件成为决定宗教圣地兴盛与否的重要因素。如明人谢肇淛所言：“山川须生得其地，若在穷乡僻壤，轮蹄绝迹之处，埋没不称者多矣。如姑苏之虎丘、邹之大峰，培茀何足言？而地当舟车之会，遂令游咏赞赏，千载不绝。岂非有幸不幸耶”<sup>[6]67-68</sup>？因进香泰山而兴修道路情况较多：汉武帝元鼎四年（前 113）既得宝鼎后，公卿议封禅事，为封禅“而天下郡国皆豫治道桥”<sup>[24]1438</sup>；宋太平兴国九年（984），“泰山父老千余人复诣阙请封禅。戊子，群臣上表请封禅……诏以今年十一月有事于泰山”，为封禅之事，亦“命南作坊副使李神佑等四人，修自京抵泰山道路”<sup>[25]</sup>。

明清时期，无论是定鼎南京时北控京蓟、辽东，还是迁都北京后南控江浙、闽广，还是黄帝出巡南游，都需便利的交通勾连南北。而地处北京、南京中间的济南乃至泰安，则成为南北干道的必经之处。“南京至辽东都司路”、“北京至山东路”、“浙江福建官路”、“江西广东官路”均有支线与泰安相连。其中，“浙江福建官路”中自泰安至红花埠一路，较之兖郡至韩庄闸稍远，似应从中路行，但“圣祖仁皇帝时多由东路，或中路虽稍近，不如东路之便”<sup>[26]</sup>，皇帝的青睐，使该段成为南北之孔道、九省之通衢。另外，还出现了专门的进香之路，如徐州至泰安州泰山顶路：“本州。九十里沛县。七十里临城驿。七十里滕县。四十五里界河。五十里邹县。六十里兖州府。六十里宁阳县。七十里东巷店。五十里泰安州。五里红门。四十里至泰山顶。即东岳岱山”、济宁州至泰安州山顶陆路：“济宁州。四十里沿村店。二十里安桥。三十里宁阳县。三十里红边屯。过渡。二十里奶奶庙。二十里东巷店。三十五里灌口。二十五里泰安州。十里红门。上山。五里高老桥。五里水帘洞。三十里泰山顶。”<sup>[27]</sup>

山内道路而言，最早的登山之路辟于何时已无从考证。孔子登泰山时还是“枳棘充路，陟之无缘”的艰险之途<sup>[15]196</sup>。秦始皇封禅时，“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菝萁，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贲郎将先上山，三案行。还，益治道徒千人”<sup>[28]</sup>。这两次封禅活动，均促进了泰山道路的兴修。

明清时期为满足香客进香的需要，新辟或修

复了泰山盘道多条，基本形成了今天泰山道路的状况。登山中路亦称红门路是泰山开辟最早道路，古代帝王及游人、香客多由此路沿阶而上，故明清对其修葺较为频繁：嘉靖三十四年（1555），泰安知州郑聚东等对泰安一天门至南天门全程盘道进行大规模拓建重修，全部砌以石阶，十八盘立铁柱絙索，以便行人。并于一天门前立“盘路起工处”碑<sup>⑤</sup>。因万历十四年（1586）十月十八日，泰山碧霞宫，四方来焚祷者，互相践踏，死六十一人<sup>[15]194</sup>，故万历十七年（1589），山东参政吕坤于龙门坊开辟新盘道，“建渡天桥，令登岱者上从东而下从西，无相践踏”；康熙五十六年（1717）“六月六日，泰山大水，盘路祠庙皆圯，命江南学政林之瀚、江西学政鱼鸾祥重修……乾隆三十六年（1771）五月十五日夜，泰山水，盘路圯，知府夏玠重修”<sup>[29]</sup>。此后，道光七年（1827）河南开归道员麟庆、光绪八年（1882）山东巡抚道铨、光绪十二年（1886）山东巡抚陈士杰及光绪三十二年（1906）泰安知州李于锴等均对中路盘道进行了修葺。而岱阴西路、岱阳东路也因其独特风光成为众香客青睐的登山之道。此外，若皇帝登山祭拜，还要专门开山辟道，“东巡大差为期不远，总须另辟大道”<sup>⑥</sup>。

岱阴道路以幽静、奇险著称，亦多开辟于明清时期。岱阴西路，“人自京省来岱者，道出岱西，北抵店台东，南行趋桃花峪，上下山阪者十数至焉。又四十里达顶，路省山前三之一”<sup>[10]426</sup>。岱阴北路，以北天门为隘，济南、历城、章丘等地的香客多沿此路登顶。万历十八年（1590）十月，岱阴游者日众，山东巡抚按司道委派宋自厚修后石坞盘道<sup>[30]</sup>。又道光七年（1827）《修补泰山钦工石路并后石坞山径祠墓记》载：“兹山之妙在后石坞，惜乎荆棘横封樵歌；下上即碧霞元君祠墓，世所崇奉，亦鞠为冷烟荒草无他，以其崎岖难行耳……兹复属魏公，于后石坞相度创开石径”<sup>⑦</sup>。与岱阳道路相比，岱阴多为游人罕至之处，明人宋焘记曰：“万历辛卯（1591），余与刘文学斌，以里选赴省会。我两人雅好探奇。闻泰山后有山径，景趣幽僻，堪以游目。所经扫帚峪、牛栏口、玉皇岭，终日不逢人。但山鸟乱啼……应接不暇……竭二日之力，仅行一百五十里。天雨蒙蒙，四山隐晦，迷失行径”<sup>[31]</sup>。

（二）朝山进香对泰安政治发展的重要影响。泰安县“附郭，周为齐地，又为鲁北境。秦属齐郡，汉为博、嬴、奉高三县，地属泰山郡治奉高，后汉、晋、宋因之。魏属泰山郡，隋属鲁郡，唐属兖州鲁郡。宋改曰奉符，属袭庆府。金为泰安州，元因之”、“明洪武元年（1368），省

奉符入州，割长清与州，并隶济南府”<sup>⑧</sup>，雍正二年（1724），升泰安州为直隶州，领泰安、莱芜、长清3县；雍正十三年（1735），升州为府，设县为府治<sup>[32]</sup>，下辖泰安县、肥城县、新泰县、莱芜县、东平州、东阿县、平阴县等六县一州。泰安行政区划等级的提高，与泰山地位的尊崇及香客经济所带来的城市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诚如宋思仁所言：“泰安之为郡、为州、为县，实以泰山故也”<sup>[33]18</sup>。

（三）朝山进香对泰安城乡经济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而易见。明清时期大量的香客涌入泰山，政府竟对上山进香之人征收香税。“曷云乎香税也？四方祈禳之士女，捧瓣香谒款神明，因捐施焉，而有司籍其税以助国也”<sup>[15]188</sup>、“泰山香税乃士女所舍物，藩司于税赋外资为额费”<sup>[34]</sup>。此外，香客为表示心诚，还大量施舍金银等物，统称“混施钱”，此两项收入每年多达4万余两。这些钱在正德十一年（1516）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间，均由经管官员负责，每年分两季解赴山东布政司储库，供本省建设之用。嘉靖三十七年之后，每年约向国家缴纳香税22000-23000两。除上缴部分外，余下者亦在20000两左右，其中铜钱解赴礼部，其它大部分储藏在布政司库内，以补本省征收不足之田赋；充当官府公务、修城、修庙等项之费用；充当藩府禄粮、山东三司、盐运司及济南府官员俸禄。此外还用于赈灾、用作地方开发经费、修理王府及灾后重建等众多方面<sup>[35]</sup>。这些钱数量较大，用途甚广，不仅增加了朝廷收入，还减轻了山东人民的负担，推动了泰安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

朝山进香在为朝廷和地方政府带来香税收入的同时，也为当地提供了众多就业机会，“方其摩肩涉远，接踵攀危，襁至辐辏，岂特助国而已？舆厮赖以食力，市肆赖以牟利，僧徒赖以衣钵，即行丐亦赖以须臾无死”<sup>[15]188</sup>。故旅店、餐饮、肩舆及销售等行业迅速发展起来，本地人“饮食香楮，贾人、旅肆咸籍以为生”<sup>[34]</sup>。其中，集住宿、餐饮于一体的香客店在泰安影响较大，兴起时间较早。发展到明清之季，可谓是盛极一时，其不但数量多，规模大，且服务周到。明人张岱曰：“离州城数里，牙家走迎，控马至其门，门前马厩十数间，妓馆十数间，优人寓十数间”<sup>[21]151</sup>、“客店至泰安州，不敢复以客店目之。余进香泰山，未至店里许，见驴马槽房二十三间；再近有戏子寓二十余处；再近则密户曲房，皆妓女妖冶其中。余谓是一州之事，不知其为一店之事也……店房三等……贺亦三等……计其店中演戏者二十余处，弹唱者不胜计，庖厨饮爨亦二十

余所，奔走服役者一二百人。下山后，荤酒押妓，惟所欲。此皆一日事也。若上山落山，客日日至，而新旧客房不相袭，荤素庖厨不相混，迎送厮役不相兼，是则不可测识之矣。泰安一州与此店比者五六所，又更奇”<sup>[36]</sup>。

明清易代，泰山香客锐减，但随着政治局势的稳定及乾隆初年对香税的蠲除，至乾隆中期，朝山进香活动再次活跃起来，香客店又恢复了繁盛。《东游纪略》载：“傍午抵泰安，寓城西刘氏客馆，馆可容千人。主人云：‘邻宋氏且容三千人不止也。’颜黄门曰：河北人信万斛之舟，江南人信千人毡帐。谅哉斯言。”如此规模的客店，在当今也屈指可数。随着香客经济的繁盛，泰安城镇体系逐步完善，城市布局日趋合理。至乾隆中叶，“遥参亭前，四民辐辏，炊釜蒸沸，在城中最称浩穰。东隅迎暄门外环水漾绕，士农与逐末者半；南隅泰安门外为京省东西通衢，冠盖往来，废著繁集；西隅岳晏门外西自旧校场南抵社首，烟火数千家，大街百货杂陈，循河一带粟、蔬、鱼、果、薪炭、器物之类无不备具；北隅仰圣门外西通新街，东连铜器行，市肆鳞次。每当香客云集，饶鼓喧闹，直达红门以上，夜半灯火如繁星罗布，亦岱麓奇观也”<sup>⑨</sup>，以进香道路为主，泰安城内道路体系逐步完善起来。

（四）进香活动的兴盛在带动泰安城乡经济的繁荣和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如乾隆十二年（1746），高宗驾幸泰安之前，山东抚臣阿里衮等“亲赴泰山，相度诸务。其自驻蹕之宫殿，道路之经纬，祠庙之整饰，至于修广向背以及鸠工庀材，一切巨细之事，莫不纲举目张，逐加指授”；“自红门至于岱顶，计二十余里，致斋宴息之所，何可略也。乃于南天门内、碧霞宫之东、玉皇庙、朝阳洞四处，各建行宫，以为驻息之地”；同时，由于“回马岭以上，山径渐峻。至南天门，环路回绝，援絙索而上，犹怖其险”故为给皇帝登山提供便捷，“乃倡为天桥之设，驾木叠板，纾折而上，自券台至升平坊，凡六处，为桥六百三十一丈有奇。微独步从之，便可策骑而登矣。曰天桥，寓尊也”<sup>[33]226</sup>。而行宫之规模亦较大，“在南天门者，周垣深十七丈五尺，广二十丈。宫门三间……北为宝殿三间，又北为内殿五间……东又宫门一间……又北为正殿三间，又北为中殿三间，两翼有廊，又北为内殿五间……内膳房三间，又北膳房四层，共二十四间。又迤北膳房四间，又西侧膳房三间”<sup>⑩</sup>。这些行宫、天桥的修建，需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增加了当地民众的负担，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亦是显而易见的。这种铺张浪费、妄滋糜费

的行为，亦得到皇帝怒斥，“从前阿里衮办理东巡，营建过多。经朕降旨宣示，准泰岂不知之……而泰山天桥等工……是诚所谓小聪明，是大糊涂也……办事全无实意，而下愚不移。弄巧成拙”、“至朕登岱经由道路，只须就现成山径，略为除治，足资策骑。总不得仿照从前搭盖天桥，重劳工作”<sup>[37]</sup>。

香客云集、商业发展的同时，当地的社会风气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泰安风俗“马端临《舆地图》曰：‘人情朴厚，俗有儒学’；张从仁《文庙记》曰：‘风俗淳朴而尚俭素’；（弘治间）李锦撰《州志》曰：‘士尚诗书，民执常业’；（万历间）任弘烈纂《志》则曰：‘风移俗易，浸淫于贸易之场，竞争于锥刀之末，民且不自知其习于浮华而风靡下也’；（康熙间）以余耳目所闻睹，学士大夫循循笃行古风者什之二三，而庶民之家莫不鹜纷华、美冠履，以相矜诩，且也劲悍负气，甚者以屑越细，故酿成大祸而不知悔云”<sup>⑪</sup>。而这种变化的原因乃“以岱岳祠庙，五方辐辏，皆浸淫于贸易之场”<sup>⑫</sup>。总之，明清时期各阶层的朝山进香，将泰山的进香活动推至顶峰。这一方面带来了香客经济的繁盛，促进了泰山内、外道路的兴修，推动了泰安城市的发展、政治行政级别的提高及地方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为接待皇族的朝奉而进行的宫殿、道路工程的建设，也加重了当地民众的负担，而商业风气熏陶下民风、民俗的转变乃至恶化亦不容忽视。但两者相较，前者的影响更大，意义更为深远。

#### [注 释]

- ① 社会阶层分为特权、平民、贱民三个等级。其中，特权等级又包括皇帝、贵族、缙绅和士人；平民等级又包括庶民地主、自耕农、商人、平民佃户、平民佣工、手工业者等；贱民等级又包括奴婢、乐户、丐户等。见冯尔康主编：《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589-632页；冯尔康著：《中国社会史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263-304页。
- ② 见《清圣祖实录》“康熙二十三年十月癸卯条”、“康熙二十八年正月乙酉条”、“康熙四十二年正月壬申条”；《乾隆帝起居注》“乾隆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癸未条”、“三十日甲申条”、“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壬申条”、“乾隆二十七年四月十九日壬午条”、“二十日癸未条”及《清高宗实录》“乾隆三十六年二月丁酉条”、“乾隆四十一年三月丁亥条”、“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乙酉条”等。
- ③ 参看胡瑄《泰安州志》卷4，弘治元年刻本。
- ④ 参看孟昭章《重修泰安县志》卷14，民国十八年刻本。

- ⑤ 见网站：中国泰安—中华泰山—泰山石刻，  
http://www.taian.gov.cn/zhts/task/tiji/200712/t20071204\_79003.htm。
- ⑥ 参看蒋大庆《泰安县志》卷10，道光八年刻本。
- ⑦ 见网站：中国泰安—中华泰山—泰山石刻，  
http://www.taian.gov.cn/zhts/task/shique/200712/t20071204\_79116.htm。
- ⑧ 参看邹文郁《泰安州志》卷1，康熙十年刻本。
- ⑨ 参看萧儒林《泰安县志》卷2，乾隆四十七年刻本。
- ⑩ 参看成城《泰安府志》卷6，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 (1) 参看成城《泰安府志》卷2，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 [参考文献]

- [1] 李光庭.乡下游踪[M].北京:中华书局,1982:15.
- [2] 赵昇.朝野类要[M].北京:中华书局,1985:9.
- [3] 丁世良,赵放.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 [4] 无名氏.道山清话[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333.
- [5] 陈淳.北溪字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3:63.
- [6] 谢肇淛.五杂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 [7] 吕继祥.泰山娘娘信仰.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
- [8] 朱宏伟.一则珍贵的碧霞元君信仰史料[J].民俗研究,2004(3):186-187.
- [9] 陈鹤.明纪[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329.
- [10] 唐仲冕.岱览[M].泰安:泰山出版社,2005.
- [11]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105.
- [12]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3565-3566.
- [13] 周郢.泰山志校证[M].合肥:黄山书社,2006.
- [14] 谭迁.国榷[M].北京:中华书局,1958:1285.
- [15] 马铭初.岱史校注[M].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2.
- [16] 清仁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283.
- [17] 叶涛.泰山香社传统进香仪式研究[J].思想战线,2006(2):80-90.
- [18] 刘慧,陶莉.关于宋代的泰山香会[J].民俗研究,2004(1):120-128.
- [19] 程穆衡.听雨闲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30-231.
- [20] 叶涛.泰山香社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95.
- [21] 张岱.琅嬛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22] 泰安市文物局.泰山石刻大全[M].济南:齐鲁书社,2006:174.
- [23] 西周生.醒世姻缘传[M].济南:齐鲁书社,1980:889-890.
- [24]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2:576.
- [26] 高晋.南巡盛典[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1517.
- [27] 杨正泰.明代驿站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52,343.
- [28] 朱孝纯.泰山图志[M].泰安:泰山出版社,2005:93.
- [29] 聂剑光.泰山道里记[M].泰安:泰山出版社,2005:46-49.
- [30] 曲进贤.泰山通鉴[M].济南:齐鲁书社,2005:147.
- [31] 宋焘.泰山纪事[M].泰安:泰山出版社,2005:354.
- [32] 清世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381,932.
- [33] 宋思仁.泰山述记[M].泰安:泰山出版社,2005.
- [34] 王士性.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2006:240.
- [35] 成淑君.“自是神人同爱国,岁输百万佐升平”——明代泰山碧霞灵应宫香客经济初探[J].济南大学学报,2003(3):38-41.
- [36] 张岱.陶庵梦忆[M].北京:中华书局,2007:56-57.
- [37] 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464,924.

## On Taishan Pilgrimage and Related Problem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ENG ZHAOFENG, WANG YUANLIN

(Research Centr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Mountain Tai is the first of the Five Sacred Mountains, enjoying high favor traditionally. With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emperor's Fengshan event, Mountain Tai established its position. The people went to Mount Tai from all quarters and ascended at Mount Tai to worship the God and became faithful pilgrims of Mountain Tai. According to the inscriptions record of Mount Tai,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veryone began to go to Mountain Tai out of various reasons, and Mountain Tai faith reached its peak. The prosperity of the pilgrimage gave a promotion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oad construction. But it increased people's burden, and changed the Social customs etc.

**Key Word:**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aishan pilgrimage; Class; Reason; Influence